

全球化視野下的

中國儒學研究

吳震
主編



孔學堂書局
CONFUCIAN ACADEMY PRESS

本书获2015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基金资助

全球化视野下的
中国儒学研究

吴震
主编

本书获2015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基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儒学研究 / 吴震主编.

—贵阳: 孔学堂书局有限公司, 2015.9

ISBN 978-7-80770-029-6

I. ①全… II. ①吴… III. ①儒学—研究—中国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5836号



孔學堂書局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儒学研究

出品人	赵宇飞
监制	李筑
主编	吴震
责任编辑	姚云凤 黄艳 窦玥声
装帧设计	张莹
责任印制	严德飞

出品	当代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孔学堂书局
地址	贵阳市乌当区大坡路26号
发行电话	(0851) 85890231
印制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16 787mm × 1092mm
印张	36.5
字数	532千字
印数	1—2000册
书号	978-7-80770-029-6/B·040
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前 言	1
-----	---

一、总论篇

综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人物及其问题意识与学术贡献 / 郭齐勇	13
庶民社会的儒家教化 / 潘朝阳	55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cal Texts / [美]艾文贺	96

二、海外中国新儒家思想研究

论熊十力与马一浮的思想交流与学问异同 / 景海峰	115
无相的疑惑 ——关于牟宗三以“放得下”论无相建构相即式合一的一种讨论 / 杨泽波	133
牟宗三的现代化论述与超越现代化关怀 ——以《时代与感受》为中心 / 黄丽生	149
现代新儒学研究中的思想视域问题 / 黄玉顺	173

三、中韩近世儒学研究的交错

13—14世纪韩国对朱子学的吸收 以及牧隐李穡思想的哲学根基 / [韩]崔英辰	189
从主理的观点看朱子的哲学 / 杨祖汉	206
韩国近代儒教宗教化运动的思想特色 ——以李炳宪的孔教运动为主 / [韩]李妍承	224
17世纪朝鲜士人眼中的阳明异端与薛瑄从祀 ——以许篈《朝天记》为中心的考察 / 王鑫磊	246



目录

四、中日近世儒学研究的交错

- 文化交涉与日本私塾
——兼论泊园书院 / [日]吾妻重二·····287
- 中日阳明学者对“真我”的体证比较 / 张崑将·····310
- 琉球士人汉籍学习举隅
——以汉籍中写入的训点和注记为考察中心 / [日]水上雅晴·····340
- 狩野直喜的文人情趣
——以狩野直喜与湘籍学者的交往为例 / 刘岳兵·····358
- 日本儒学“古学派”对形上学的颠覆
——以荻生徂徕的儒家经典诠释为核心 / 吴震·····373

五、台湾地区及越南的儒学研究

- 清代台湾儒学发展与孔庙 / 游维真、杨儒宾·····439
- 越南儒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越]丁克顺·····483
- 越南儒教的研究状况
——以“孝”的思想为中心 / [越]佐藤瑞渊·····496

六、美国中国儒学研究的交错

- 如何在西方哲学语境中做中国哲学
——以儒学研究为例 / 黄勇·····511
- 莱布尼兹对是否有中国哲学的讨论 / [美]方岚生·····538
- 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先秦思想 / 白彤东·····552

前言

2013年5月25日至26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办召开了“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儒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Studies of Confucianism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本次会议是在2011年度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人文学科研究重大项目“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儒学研究——海外与本土儒学研究的交错与展望”(2011RWXKZD010)的资助下,由项目主持人吴震及其成员杨泽波、白彤东、王鑫磊共同策划得以顺利召开的,会议还得到哲学学院院方以及作为协办方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部分资金支持,作为会议组织者,我们应首先在此向来自“五湖四海”的与会专家学者以及上述提供资助的单位表示衷心感谢!在时隔一年半之后,将会议论文编成本书予以出版之际,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会议背景。

我们知道当今“全球化”浪潮在各个社会领域正在发生越来越显著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随着经济领域全球化浪潮的持续高涨,在文化思想领域业已明显感受到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冲击,例如人们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前现代的传统地域文化如何可能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作为地域文化资源对促进世界各文明传统之间的对话产生积极的作用?又如中国传统儒学尽管在历史上曾作为跨地域的文化资源在

东亚社会发生过普遍影响，然而在当下全球化时代，儒学传统却面临如何立足本土、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去迎接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学术挑战。另外，在全球化要求重新思考我们的伦理生活之际，我们究竟可以从传统儒学那里获取哪些创造性资源，以寻求一种适合全球化时代伦理生活的新型儒家伦理学？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已经不能安于改革开放前那个封闭时代的惯性思维：仿佛我们只须打倒传统便可获得新生，或者只须关起门来自力更生便可走遍天下都不怕，哪怕出现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之现象亦不以为忧——因为问题的根源总是在“他者”（西方）的身上。在当下，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已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经济物质领域的一条腿发展方针是难以为继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滞后必将反过来影响“发展是硬道理”这条定律的全面推进。而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重新树立起“中国”自身的价值体系，无疑就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批判性反思，同时展开积极的创新性探索。要之，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然趋于跨国界、跨地域、跨文化、多元性之态势的背景下，儒学研究已不能再安于自身的“一国”之域，更应打开国界、放宽视野，以迎接时代的挑战、寻求对话的前景。

基于对上述我们身处的时代社会之背景的思考，“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儒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应运而生。

本次会议除“大会报告”（今编入第一场“总论篇”）以外，分设五个专题场次，议题涉及海外当代新儒学、中国儒学、韩国儒学、日本儒学、台湾地区儒学、越南儒学以及美国的儒学研究等各个方面，而各位学者所探讨的问题则相当专业深入，可以用丰富多彩、多元多层来概括本次会议的特色。会议共有25篇论文发表，各位学者提供的都是专为本次会议撰写而未发表的学术论文，由于会后的学术审查以及国外期刊上发表后的著作权等原因，现在收入本论文集的有22篇。本论文集的结构与本次会议召开时设定的场次基本一致，只是根据论文内容略有调整。以下顺次介绍各篇论文主旨，挂一漏万或归纳有误也许在所难免，还请见谅。至于各篇论文的学术价值及其意义，惟有交由读者评判。

第一场“总论篇”共收3篇论文。郭齐勇《综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人物及其问题

《意识与学术贡献》有感于“现代新儒学”与“当代新儒家”这一过于细化的分类有可能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20世纪初以来涌现的新儒学思潮的总体特质，故作者以广义的新儒学观，打破以心性儒学为基本特质的熊十力至牟宗三、刘述先一系列的“当代新儒家”与以梁漱溟、钱穆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之间的隔阂，统称为“现代新儒学思潮”，并将它们置于20世纪初以来风云变幻的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中，对该思潮的学术风貌、思想特征、理论建树等各个方面展开整体的观察和反思，指出新儒学思潮在如何克服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以反省现代性问题，如何通过“文明对话”以重建“文化中国”的问题，如何应对儒家价值与全球伦理、生命伦理之关系以及如何调适儒学与现代民主及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等，展开了颇具深度的思想探讨并有重要的理论建树，尽管新儒学思潮仍然存在一定的思想困局。最后作者强调儒家价值通过重新定位仍可发挥现实作用，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满足于儒学理论的精致化，而更应将儒学推向现实世界、民间生活。

潘朝阳《庶民社会的儒家教化》将审视角度设定在这样一个问题：儒学在下层社会构造中特别是在生活世界中何有地位、作用及其意义。关键词有三：宋明新儒学、庶民社会、教化意义。潘文透过对宋明以降乡村社会普遍出现的“乡约”制度、“乡治”方式、“宗祠”建构以及民间“会讲”等方面的考察，力证儒家的道德理想其实就深深扎根在庶民社会中，因此若将儒家思想从民间教化活动中抽离出来，必将失去其在中国历史中的本质。在潘文看来，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唐君毅等在努力追寻心性儒学之真谛的同时，也不忘强调指出儒学精神、礼乐教化早已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之常轨，与世俗社会密不可分。潘文从孔子原始儒家讲起，指出孔孟儒家的道德理想原本就具有贴近庶民社会之特质，经宋元明清新儒学的一番激荡，儒家经典理论加速了世俗化进程。最后文章切入台湾儒学在庶民社会的传统建构等问题，这部分论述给予大陆读者诸多有益的启发。

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理解传统中国哲学文本》是篇英文论文，关注的重点在于方法论问题，主要考察中国哲学文本的诠释方法问题。作者指出，对于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而言，有必要依三个步骤顺次推进：首先，对于哲学文本之本

义的重建,是整个研究得以可能的基础性工作;其次,在确切把握文本意义的基础上,才能进而展开哲学性的诠释;第三,在前两项工作的基础上,有必要更上一层楼,对中国哲学蕴含的问题作出创造性回应。当然同时也不能忘记在自己所采用的诠释方法之背后,必含有思想性的建构,并有必要注意到“诠释”才是中国思想家所要表达的哲学观点,而努力为这种诠释进行辩护是一项独特而重要的思想活动。作者指出在探讨概念及方法等问题之外,也应注意传统注疏对中国思想家而言不仅是一种信念的表达,甚至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展现,故须考虑并澄清注疏在整个中国哲学传统中的特殊地位。

第二场“海外中国新儒家思想研究”共收4篇论文。景海峰《论熊十力与马一浮的思想交流与学问异同》聚焦于现代第一代新儒家两位核心人物熊十力与马一浮的思想交谊及学术分歧的问题,指出熊马两人的学术因缘经历了“由亲而疏”“彼此砥砺”“相距益远”之过程;在思想性格上,熊重在哲学创发,主中西兼容,而马则以复兴儒学传统、重振“六艺”精神为己任,虽两者在思想归趣、治学背景等方面有诸多不同,然他们却能彼此推重、互为思想支援,表现出君子式“和而不同”之风格,这在当代学界实属异数。然客观言之,熊的影响更大,竟能在当代哲坛大放异彩,渐为现代新儒家之主流,而马的影响则在新近兴起“国学热”之后,并在复古思潮的推拥下方才走向前台,至于今后能否有后续创造性思想之呈现则难以预判。

杨泽波《无相的疑惑》是对牟宗三思想的一项批判。作者所要探讨的问题是:牟宗三美学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无相”能否证成真善美“相即式合一”的理论。杨文指出,牟宗三为达此目的,须首先破除康德的以判断力沟通自然与自由两界的观点,并以“放得下”为分析工具来论证“无相”,进而实现“相即式合一”的理论建构。然而杨文认为牟的这一理论企图是失败的,因为人虽可以做到“审美而无审美之相”,但并不能以此来证明“审美而美无美相”,理由在于“美”是一种主观的赋予,任何美都必然有自己的相,美本身就是一种相。由此,“无相”不能成为审美判断的先验原则,以此建构“相即式合一”理论便难以成立。

黄丽生《牟宗三的现代化论述与超越现代化关怀》主要透过牟宗三《时代与感

受》一书，来检视当代新儒家对现代化与文化意识的相关论述及其超越现代化的终极关怀。作者首先对当代新儒家的现代化观念进行了探讨，进而审视中国文化传统在面对现代文明危机与后现代社会失序等问题时能提供哪些反思资源，最后的理论企图则是：经由上述讨论来强调儒家价值在后现代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与意义。黄文指出：根源于传统，立身于现代，以文化传统吸纳西学，期使民主科学在中国生根发展，这是当代新儒家迎接现代化挑战之际所作出的根本回应；然而反观当今台湾学界，却迄今未见对已然发生的后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提出相应的反省批判以及本土论述，于是，透过彰显儒家价值、批判西方现代文明以求超越现代化的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勇气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宝贵，值得我们重视；而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对现代化的批判反思，正预示儒家价值在后现代社会仍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黄玉顺《现代新儒学研究中的思想视域问题》基于其长期以来有关“生活儒学”之问题的思考，提出了“存在一生活”之思想视域这一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的概念，意图以此探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形上学视域的问题。黄文认为，现代新儒学从其发生发展而言，既源于现代性诉求、民族性表达的历史境遇，又展现为由现代性向当代性的转进可能，但是究极而言，现代新儒学毕竟属于形而上学言说方式及现代性言说方式，从而错失了“存在一生活”视域。而“存在一生活”视域是一种真正彻底的当代主义立场，而儒学要完成当代性的转化，必须批判反思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言说，从而克服现代新儒学偏离“存在一生活”视域的过失，以迎接近年大陆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到来。

第三场“中韩近世儒学研究的交错”共有4篇论文。[韩]崔英辰《13—14世纪韩国对朱子学的吸收以及牧隐李穡思想的哲学根基》透过14世纪高丽末期著名儒者李穡的性理学思想，来观察其对朱子学的独到理解，以为我们思考朱子学在韩国如何得以吸收、转化及发展等问题之一助。崔文指出，李穡对朱子学的理解极富哲学性，从“费/隐”的形上学问题到“本心”“太极”“诚敬”等本体工夫问题，李穡在朱子学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深化的理解，特别是其企图打通心性，将“心”提升至“太极”“天”的高度来加以肯定，就显然逸出了朱子学的思维框架而有新的理论

创获，预示韩国朱子学的发展方向以及可能。

杨祖汉《从主理的观点看朱子的哲学》在厘清宋明儒学中“主理”的各种涵义之同时，将韩国朝鲜王朝儒学史上的主理派思想作为反观朱子学的一面借镜，进而指出朱子的格物理论之旨趣在于经由对理的充分了解以给出真正的道德行为，这一义理形态正可用“主理”来规定。但此理与心截然为二，故不能以心作为道德行为的根据，只是心对理有本具的知识，通过即物穷理而真知其理之存在，便能使人容易体会到当然不容已之道德之理可为自身的道德行为提供依据。由于人心可以拥有对理的本来认识，并可以此作为当然不容已之行为根据，则朱子的格物致知论就并非缺乏本源的而应当是有超越根据的工夫理论。作为超越根据之理虽非心体的当下呈现，然通过心知明理的工夫落实，一旦对本有之理获得真知，则此心中之道德之理就必有不容已地生发的实践动力，而这应当是朱子思想为一“主理”之形态的本有之义。

[韩]李妍承《韩国近代儒教宗教化运动的思想特色——以李炳宪的孔教运动为主》一文以近代韩国特别是20世纪初日帝殖民时期的由李炳宪倡导的“孔教运动”为考察对象，探讨近代韩国以重建儒教为核心关怀的“儒教宗教化”运动的理论建构、思想特色。指出孔教运动的兴起与当时民族主义史学潮流中有关韩国固有民族宗教“大宗教”的某些观念有诸多渊源，经李炳宪对孔教的重新解释，力证孔子也十分仰慕天帝所处的朝鲜疆域，故孔子虽非“东夷人”，但其开创的儒教却能覆盖东夷族而具普遍之意义，因此“吾族当奉儒教”。这种具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孔教理论并没有在当时儒教界以及一般民众的信仰生活中得以落实生根，但其思想活力却在韩国近代社会留下重要轨迹，成为当时爱国启蒙、民族独立运动的一种重要声音。有趣的是，李炳宪是康有为的外国弟子，而其思想则比康更显激进，反对儒教国教化而欲将儒教引入教会化、民族化这一极端方向。

王鑫磊《17世纪朝鲜士人眼中的阳明异端与薛瑄从祀——以许筠〈朝天记〉为中心的考察》利用异域朝鲜留下的历史文献，对1574年发生在中国和朝鲜知识分子之间关于阳明学的一次论辩进行分析，尽量客观地呈现两国学者因思想差异而产生



蔡元培下令废止中小学与师范学校读经，这都是儒学在制度上受到重创的大事件。1919年五四运动以降，西化狂潮席卷宇内。尽管如此，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有关国学、儒学的基础教育在公私立中小学中仍普遍受到重视，中小学生的国学基础比较好，公私立大学的中文、国文系也办得很好，甚至连所有的教会大学都相继建立了相当不错的国文系，专门学校例如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等就更不用说了。作为通识教育的“大学国文”的课程建构起来并起了重要作用。彼时社会民间文化的空间比较大，在官、民、学三股力量的支持下，20世纪20年代末至抗战前，国学、国医、国药、国艺、国乐、国术、国画、国剧等都兴盛起来，形起了“国字号”的社会文化运动。这些，恰好是在借鉴西学及中西学合流的背景下产生的，然而，毫无疑问，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5年1月，国民政府官方和陈立夫先生授意陶希圣、何炳松、王新命、黄文山、萨孟武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引起了关于本位文化问题的论战。《宣言》遭到真正的“全盘西化派”的陈序经和主张“充分世界化”的胡适等人的批判。具有强烈官方色彩的《文化建设月刊》（1924—1937）学派在持论基点上与“国粹”“学衡”和我们下面要谈到的“现代新儒家”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他们是“把价值建立在民族文化本身的现世层面，并且因而他们的现代化理论以科学主义式的混合主义为基础。他们强调科技是历史发展的枢纽，科学思想就是现代社会秩序的自然伴随物，并且主张按照科学标准来调和中西方的精华”^[12]。陶希圣等“文化建设派”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认同当今而不是发掘过去，以科学主义而不是以人文主义持论，都表明他们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潮。但应当承认，他们在知识界仍有一定的影响。

现当代新儒家并非异军突起。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从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玄学派、学衡派、国字号运动到现当代新儒家，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以上社会文化、学校教育之背景与土壤，孕育了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产生。

[12] [美]傅乐诗(Charlotte Furth):《现代中国保守主义的文化与政治》，《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第71页。

当然主要是在近代中国挨打、出现意义危机的背景下产生了本思潮。

二、本思潮形成、发展的诸阶段与诸人物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形成于1915—1927年发生的東西文化問題論戰與1923—1924年發生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期間。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馬一浮等。以上也可以視為本思潮發展的第一階段。以後的三個階段，時空轉移，頗有意思。第二階段發生在抗戰時期與勝利之後的中國大陸，第三階段發生在20世紀50至70年代的中国台灣與香港地區，第四階段發生在20世紀70至90年代的海外（主要是美國），改革開放後又由一些華人學者帶回中國大陸。第一階段可以簡稱為五四以後的新儒學（家），第二階段可以簡稱為抗戰時期的新儒學（家），第三階段可以簡稱為港台新儒學（家），第四階段可以簡稱為海外新儒學（家），改革開放後返輸中國大陸。

1986年始的十多年間，方克立、李錦全二位教授領導了國內三十多位學者參加的一個“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組，從整理、匯編資料與學案等工作開始，直至專人、專題研究，產生了一大批學術成果。我個人也有幸參與其事。這個課題組選擇的研究對象的名單，逐步完善，最後做了“現代新儒學輯要叢書”或專人研究系列叢書的，包括三代十五人：第一代：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馬一浮、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第二代：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第三代：余英時、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13]

近年，劉述先綜合諸家，提出了三代四群（十五人）的架構：

第一代第一群：梁漱溟（1893—1988）、熊十力（1885—1968）、馬一浮

[13] 詳見方克立：《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國大陸地區學者們有關現代新儒學的資料整理、個案與整體研究的情況，請詳見郭齊勇：《近20年中國內地學人有關當代新儒學研究之述評》，載《人文論叢》2001年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胡治洪：《近20年我國大陸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徐洪興主編：《鑑往瞻來——儒學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

(1883—1976)、张君勱(1887—1969)。

第一代第二群：冯友兰(1895—1990)、贺麟(1902—1992)、钱穆(1895—1990)、方东美(1899—1977)。

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徐复观(1903—1982)。

第三代第四群：余英时(1930—)、刘述先(1934—)、成中英(1935—)、杜维明(1940—)。

刘先生说：“把这个架构与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四波发展配合起来看，就可以大体把握到这一思潮的脉动。”^[14]我认为在第三代第四群中还是应增加蔡仁厚(1930—)，故本文重点介绍以上十六人。蔡先生继承牟先生的思想，亦有自己的创获。实际上，现代新儒家阵营中，我认为至少还应包括如下人物，即1949年以后在美国的陈荣捷(1901—1994)，在台湾的陈大齐(1886—1983)、谢幼伟(1905—1976)、张其昀(1900—1985)、胡秋原(1910—2004)等先生。他们也有非常了不起的、甚至不亚于本文重点介绍之人物的贡献，但因我未展开研究，故本文未及讨论。至于第三代第四群的其他人物及其继起者，本节之末亦会涉及。

这一思潮在五四之后的兴起，前节已经说明。以下我们讲第二阶段：本思潮在贞下起元、民族复兴的抗战期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此期间，出现了大量的融会中西印思想文化精华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史学著作和哲学著作。其中包括熊十力富有原创性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读经示要》；冯友兰的《新理学》等“贞元六书”；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钱穆的《国史大纲》；马一浮的《泰和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唐君毅的《道德自我之建立》等。抗战胜利之后，还有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贺麟的《文化与人生》等。这些著作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够以比较健全的心态认识和理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既不能满足于转手稗贩，又不沉溺于盲目陶醉；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有了比较清醒的理性的依据，对于现代世界必然之势的认同，则增加了情感的强度；在对古今中外文化精髓

[14] 刘述先：《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2页。

有了深切了解的前提下，综合熔铸，试图创造出新的文化系统。

这一时期本思潮代表人物的活动主要有：1939—1940年间，马一浮、梁漱溟、张君勱分别在乐山、北碚和大理创办了旨在弘扬并复兴中华文化的复性书院、勉仁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1941年，《思想与时代》杂志^[15]创刊号上刊载的贺麟的论文《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被台港和海外学者普遍看作是“现代新儒学”或“现代新儒家”的宣言。该文明确提出了“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否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认为民族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贺麟认为，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一大转机，因为它“破坏和扫除了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16]。

抗战时期在大后方与《思想与时代》相类似的还有唐君毅与周辅成合办的《理想与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四川璧山，1945年创刊）《图书集刊》（四川省立图书馆，1942年创刊）等。1947年，牟宗三和徐复观在南京分别创办了《历史与文化》和《学原》，其中尤其是《学原》，成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阵地。

然后我们看第三阶段。1949年，钱穆、唐君毅、张丕介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徐复观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1951年，王道在香港创办《人生》杂志。大陆易手之后，现代新儒家以此为基地，在中国文化“花果飘零”之际，于艰难困苦中“再植灵根”，弘扬儒学。

移居港台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昔年在大陆、尔后在台港的著述，是五四以后我国文化宝库的一个重要部分。如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15] 《思想与时代》杂志，由迁徙到遵义的浙江大学张荫麟等发起创办，主事者还有张晓峰（其昀）、谢幼伟等。张荫麟1942年10月去世后，该刊由谢幼伟主编，先后在贵阳印行了40期，复员后于1946年12月在杭州复刊。这一刊物经常发表熊十力、钱穆、冯友兰、贺麟、贺昌群、朱光潜、洪谦、周一良、韩德培、缪钺、唐君毅等人的文章。

[16] 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5页。

第一代新儒家中梁漱溟、张君勱、熊十力等反复讨论了中国文化何以未能产生科学与民主的问题，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则提出了以民主政治或民主建国作为“新外王”的第一要务，以科学知识系统作为“新外王”的材质条件，充实中华文化生命的内容，以使中国人的人格有更高的完成，中国民族之客观的精神生命有更高的发展。

他们承认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近代民主制度及科学技术，致使中国未能实现现代化工业化，按照他们的理想方案，实现现代化必须以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为科学与民主立根，以西方的知性和政道补正、扩充和发展儒家内圣之学。他们观照中西文化，认为“综合的尽理精神”的中国文化过分重视道德理性（即“仁心”）的“运用表现”和“内容表现”，缺少了“分解的尽理精神”的西方文化的“架构表现”的环节，“外延表现”不足，只有道统而无学统（无科学的知识系统），只有治道而无政道（民主政治），这是中国文化的弱点和不足。有鉴于此，牟宗三提出了“三统”之说：道统必须继续，即以内圣心性之学为立国之本；学统必须开出，即吸纳、融摄西方传统，由道德主体转化出知性主体和实用技术活动之主体；政统必须认识，即肯定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性，由道德主体转化出政治的主体。^[18]

工业文明、现代化确实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人类的特性及其全面发展的问題，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意义的问题，人类产生的种种疏离和困惑的问题，乃至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问题等等。以“天人合一”模式，“圆而神”的智慧和儒家伦理转出或融摄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然后补西方文化之偏弊，救西方文化之自毁，为全人类各民族文化提示一新的方向和模式，这是半个世纪台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主要看法。

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也发生了好几起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战。例如1961年底徐复观与胡适的论战，以及由此引发的胡秋原与李敖的官司等等。但总的来

1958年元旦号，又见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等。其英文版有好几种本子，在海外有较大影响。

[18] 参见牟宗三：《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等20世纪50年代的所谓新外王三书，分别为台北学生书局和广文书局出版。



说,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相互渗透,这两大派的第二代著名代表殷海光和徐复观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化敌为友,握手言和。殷氏在临终前认同传统文化的价值,徐氏则被公认为是“以自由主义论政,以传统主义卫道”的人杰。

现当代新儒家所创制的哲学思想体系在21世纪人文哲学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他们大多数都是文化哲学家,是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他们大多有很高的悟性,是实践型、体验型的哲人。例如熊十力以《易经》形上学和船山、阳明二王之学与唯识、天台、华严、禅宗思想相渗透的理论体系,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和人文生命健动不息的特点。方东美的《生生之德》《人生哲学》体系,探讨了人的文化生命的情调、美感、悲剧与诗的问题,以宽广的文化视野,研究人的终极关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困惑和疏离的问题。唐君毅的《人文精神之重建》《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巨构,从人的生命存在这一最可靠最真实的前提出发,认识人在天、地、人、我之中的存在,理解世界和人生。他的文化哲学体系以人为体,以文为用,以道德理性为核心。他认为,人重于文,如果离开了人而言文(如宗教、如科学),则可能导致反人文或视人如非人;如果离开人之“精神上自作主宰”言自由人权,离开“道德意识”“人格平等”而言民主,则并不能有助于人之学术文化上的创造与独立的人格的形成,或使民主政治化为“分权力”或“分赃”之政治。针对现代社会使人有意或无意忘却、泯失了自己的具体存在,使人成为四分五裂的抽象的人、单面的人(即被异化、物化、外在化了的人),他们凭着对生命存在的体验,及对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文化自觉的阐扬,打开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超越了狭义的民族主义,而具有世界的价值和意义。21世纪哲学的重要问题是人与文化的问题。他们的著作可以与雅斯贝斯、海德格尔、萨特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巨匠的作品媲美。现当代新儒家学者建构的哲学人类学,在人类存在这一永恒课题的研究上所作出的世界意义的贡献,将逐步被人们所体悟。因为,不论现代化如何推进,人的终极托付,“内在的安心立命始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问题,它不能靠对于一个超越外在的上帝的信仰来解决。”^[19]

[19] 刘述先:《当代新儒家的探索》,《知识分子》(纽约)1985年秋季号。